身处边疆 心怀社稷

——明代土司田世爵的家国情怀

□ 黄柏权

容美土司是明代鄂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司政权，虽偏处武陵大山之中，但地域广袤、实力强大，东联江汉、西接渝黔，地处武陵山脉东段核心区域，鼎盛时期辖地达7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这样一个深居于西南大山的土司政权，却锻造出了几位颇具家国情怀的土司，田世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诗文传家，以文化人

田世爵幼年之时，曾遭遇家族内部的土司争袭事件。田世爵之兄白里俾因嫡长子田世宗袭职而怀恨在心，后乘机谋害世宗及世祖、世贵等诸子。田世爵则在乳母夫妇的帮助下，逃至桑植土司处避难。后经下属官员及桑植土司奏报，明朝廷派官查勘，才将白里俾绳之以法。多年以后，田世爵方才返回容美土司袭职。

幼年的坎坷艰辛使田世爵深刻认识到，家族内部血腥争袭事件，源于不读诗书，不知忠孝，不懂礼法。他世袭土司后，首先以身作则，苦读诗书，学习礼仪和治政本领。田世爵常与外地文人、官员交游往来，“重结交，与荆州藩、道、府无不密契，无岁不出，出必经年累月始回”。在其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容美土司逐渐形成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与世代传统。

为了保证子女及族中子弟接受良好教育，田世爵或延聘内地名师教授子弟，或将子孙送至容美以外的地方求学，鼓励子弟结交名士大儒，增长见识。田世爵对于子弟的严格教育收到良好的成效，他的8个儿子均有所建树。其中，田九霄“学问渊赡，神采异常，兼有文武之姿”，田九龙爱好经诗，礼贤下士，为人“宽厚明敏，于群书一览不忘”。诗文造诣最高的是田九龄，他“高才积学，以诗文齐名七才子”，并广交吴国伦、王世贞等汉地文人名士。田九龄一生创作了大量诗作，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如《白马篇》云：“威名千载上，永着玉门关。羞为剧孟辈，杀人闾里间。当今身许国，图画列台端”，抒发了对边关将士戍卫边疆、以身许国的赞颂。自田世爵父子之后，容美土司又延续诗文传家的家风，涌现出田宗文、田楚产、田玄、田甘霖、田需霖等多位诗人，他们的许多作品同样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对社稷的担忧，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

田世爵重视子孙教育，以教化治理土司内政的举措，与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土司“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政策相吻合，也从侧面可以看出田世爵的远见卓识及其对中央王朝的遵从。田世爵以诗文传家，以中华文化浸润优良家风，鼓励子孙忠心为国、尽心履职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了土司内部的统治，避免了袭职时的内部争斗；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增强了土司对中华文化和大一统的高度认同。

归心向化，服从中央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按照“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理念对土司进行治理。对土司的任命、朝贡与回赐、征调等是中央王朝管理、联系土司的重要手段，因此，朝贡历来是西南土司对中央王朝的一项重要义务。按期朝贡，纳土上贡，意味着土司对中央王朝政治上的认同与归属。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鄂西南地区土司中以容美土司朝贡次数最多，多达55次，从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嘉靖年间一直不曾中断。据《明实录》记载，田世爵父子先后朝贡近10次，贡品多为当地香、马匹、大木等。与田世爵本人密切相关的入朝进贡有7次。第一次是正德八年（1513年），田世爵差遣通事田广等贡马。第二次是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田世爵遣使进香。第三次是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田世爵派遣把事朝贡进香。第四次是嘉靖二年（1523年），再次派遣使者朝贡。第五次是嘉靖五年（1526年），贡方物贺皇帝寿辰。第六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派遣把事向受、张新进香。最后一次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献大木五十根，供嘉靖帝为其生父母修建陵墓所用。这七次朝贡，既是田世爵审时度势、不遗余力地向朝廷表达忠心的反映，也是容美土司服从中央王朝统治、遵从大一统的体现。

容美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还反映在思想认识上、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如田玄《甲申除夕感怀诗》称“余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奇遇，赤眉为虐，朱弗多惭，悲感前事，呜咽成诗”，田玄以“先帝”称崇祯，以“赤眉”喻李自成，以“朱弗”代指朱明冠裳与朝臣衣冠，而“受宠锡”“边臣奇遇”等语，则表明他虽为僻处鄂西南山区的土司，但主动纳入明王朝的君臣秩序之中，表达了对中央王朝的赤忱之心。田玄之子田需霖、田既霖所作诗词也同样含着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之意，如田需霖所作“皇皇堪自吊，痛在失君时；往事三更梦，浮名一局棋”，田既霖所作“岁序将分日，留连共此时，樽前频看剑，灯下懒敲棋”，都是其家国认同的诗意表达。

舍身抗倭，保家卫国

田世爵父子不仅按期朝贡，还积极服从中央王朝征调，镇戍平叛，在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当时东南卫所武备废弛，朝廷只得派大将募兵抗倭，招募的队伍就包括容美土兵。历史学家陈懋恒在《明代倭寇考略》一书中将抗倭兵士分为卫兵、调兵、募兵、练兵四种，“卫兵不足，于是调各地客兵，调兵可考者……容美等司兵一万”。当时总制东南军务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称：“湖广九溪等卫、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抚长官等司、麻寮等所、上崑茅等峒各有骁勇士兵，惯熟战阵，宜选各卫谋勇素著指挥统领。”在东南沿海抗倭战役中，多次可见容美土兵的身影。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田九霄率领土兵在绍兴后梅大败倭寇，取得“后梅大捷”。后又带领田九璋并与官兵配合，在嵊县清风岭伏击倭寇，斩俘170余人，取得“清风岭大捷”，此次大捷使得倭寇“既畏谭兵不敢南，复畏土兵不敢北”。胡宗宪高度评价此次战役，认为“容美兵精悍甲各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从福建流入浙江的倭寇，与钱仓寇会合。田九霄率领所部土兵，在朝廷的统一调度下，扼贼于曹娥江，将倭寇追至黄家山全部歼灭。容美土司的抗倭业绩得到朝廷肯定，田九霄被朝廷赐予红纻衣一袭，田九璋被赐予冠带。此后，容美土兵又参与了平定倭寇的“徐海之役”，取得沈家庄大捷，田九霄又被赐予赏银，承袭祖职。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容美土兵再次被征调，田世爵率兵在总兵俞大猷的指挥下围攻舟山倭寇，取得“舟山之捷”。这次抗倭之役充分显示了容美土兵的强悍实力，有人评价“二司（永顺、桑植）虽同在行间，各有功绩，而容美勋独高”。

田世爵不顾年迈携子出征，与子田九霄、田九龙、田九璋率领一万余名土兵远离家乡，赶赴东南抗倭战场。容美土兵纪律严明，采用钩镰枪弩，攻敌不备、出其不意，英勇善战、不畏牺牲，先后取得后梅、清风岭、曹娥江、黄家山、沈家庄、舟山等战役的胜利。容美官兵为国赴难，不计酬赏，田九霄将朝廷犒银一万七千两封贮嘉兴府库，坚辞不受，足见其报国不为利、赴难不计功的家国情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年过八旬的田世爵病逝于芜湖军营，用生命践行了“当令身许国”的田氏家训。明王朝嘉其忠贞，追封为宣武将军。

田世爵虽身处边疆，却始终胸怀天下，心怀社稷，心系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奉献精神，超越了土司地方利益，体现了容美土司对中央王朝的政治归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统一的自觉担当。田世爵及其子孙以诗文传家、以忠义报国、以行动服从大一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中华春秋

长泰龙津古陂灌溉工程中的治水智慧

□ 牛志奇

2026年10月14日，长泰龙津古陂灌溉工程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长泰龙津古陂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包含颜府陂和十五户陂两处灌溉工程，始建于宋朝，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溪性河流上“低坝+长藤结瓜（陂—渠—塘—圳—田）”的典型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灌溉、排水、防洪等综合效益。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工程理念

长泰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北三面环山，呈“蒲扇状”地势，龙津溪自北向南蜿蜒穿境，虽然水系发达，但这里自古“春夏多雨易涝，秋冬少雨易旱”。《长泰县志》记载，宋宁宗庆元年间，长泰“罣患频仍，旱涝迭至”，“土地不登同，户口不及万”，为穷闾僻邑之地，旱涝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崇宁元年（1102年），岁大旱，水泉皆涸。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四月不雨直至八月，大荒。明万历《漳州府志》记载：“淳熙十年九月乙丑，大风，雨水暴至，州城半没，浸八百九十余家；嘉定九年五月，大水漂田庐，害稼；十六年秋，大水坏田稼十五六。”这样的困境激发了长泰人向水求索、因势治水的强烈愿望，以颜府陂、十五户陂为核心的龙津古陂，应运而生。

宋嘉熙元年（1237年），长泰县陈巷镇彰信里乡绅陈耆公，目睹乡里良田岁岁苦旱、百姓歉收，决意兴水利除水害。他与妻子颜氏慷慨解囊，捐出自家二百四十余亩田，修筑灌溉工程。陈耆公寻访聘请民间水利名师，亲自陪同勘测地势，进行科学的选址，在旌孝里珪山麓至上苑大溪段筑坝。此处河道较为宽阔、水流相对平缓，适合筑坝拦水，还可以利用地形的天然落差，进行自流灌溉。《清理双圳陂碑记》记载，双圳陂源出旌孝里珪山之麓，至上苑大溪南岸，分为东西圳，随地设陂立闸。陈耆公在沿途设计了水闸，调控水流，根据不同区域用水需求灵活分配水量。陈耆公带领百姓开山采石，肩杵挽土，前后历时多年，终于建成“双圳陂”工程，其中东圳、西圳各筑陂8处，共16处，后因山重陂塌陷，成15处，故又称“十五户陂”。十五户陂精准布局渠网，建成后灌良田万余亩，是古代长泰建设规模最大的灌溉工程，彻底扭转了片区干旱贫瘠的农耕面貌。

龙津古陂的背后是顺水之性、因势利导的科学理念。工程依托天然河道地势，选择平缓河段筑低坝引水，构建“陂—渠—塘—圳—田”的水利灌排体系，配套分水闸、分水口、蓄水塘、泄洪口等，旱时引溪水、塘水灌溉，涝时快速泄洪分洪，实现“旱能蓄、涝能排”，彰显了长泰先民的科学智慧与生态思维。

官民协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智慧

工程长存，重在管理与制度。长泰的历代官府将兴修水利、保障民生作为核心政务，以官方权威保障水利工程长效运行。明代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599—1602年），管橘任长泰县令期间，《管侯岩溪治陂渠碑记》记载：他收到百姓“开渠佐田”的建议后，“下令业二佃一，酌时宜，相地形，市下田以浚流，开废洫以通道”。他顺应百姓所请，积极疏浚渠道，开渠助农。在其他地区大旱歉收时，岩溪渠灌溉的数里范围内却五谷丰登。

乡贤群体也是治水兴利的中坚力量。《清理双圳陂碑记》记载：清乾隆十三年，清理双圳陂的过程中“捐田捐资得以周通水利，则有绅士戴植生、杨维翰、卢灿然、杨元让暨乡宾杨蓝观”。诸多乡贤慷慨捐田捐资、大力支持修缮，保障了“双圳之兴”的再现。乡贤以声望聚民心、以资产办实事，成为连接官府与民众的核心纽带。在乡绅的带领下，乡民们主动投工投劳、参与清淤修缮，自觉遵守分水规制，守护公共水利，成为基层水利自治的根基。

“陂长制”是古陂运行的制度保障。早在宋代，长泰就建立了“陂长制”，明万历《漳州府志》记载“陂长”的选用标准：“岁选有才干者充为陂长，纠工修筑，凡灌田万有余亩，立石纪绩，至今永赖。”陂长开展渠道巡查、清淤、水费收缴、坝体修缮等闭环管理工作，杜绝工程废弛；还负责进行分水管理，依照“立石记丈数”“计亩按日轮流分管”的古制量化分水，以石碑标定各村、各户用水额度与灌溉时长，从根源上杜绝争水纠纷。《长泰县志》记载，“颜府陂，宋嘉定间创……遇霖雨大水辄坏决，随坏随修，设陂长以董成之，厥惟艰哉”，陂长还承担了陂塘的水毁修复及日常维护，提高了水利对农业灌溉的保障能力。

官府定规制、乡贤担重任、民众共参与、陂长制保障运行是龙津古陂800年活态传承的强大保障，这种朴素的协同治水模式，是长泰古代基层治理智慧的生动缩影，也为现代水利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

水润沃土、文脉绵长的深远影响

八百载活水奔流，育良田、兴文教、铸文脉、惠古今。龙津古陂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万顷良田的实用之功，更在于滋养一方文脉、传承尚义惠民的深远之力。

古陂奠定了农业发展的根基。昔日贫瘠的“穷闾僻邑”蝶变为富庶丰饶的“闽南粮仓”。《长泰县志》记载：长泰拥有礼字仓、乐字仓、射字仓、御字仓等粮仓76座，丰饶稳定的农耕基业，孕育了长泰耕读传家的优良民风。

古陂塑造了崇义向善的根脉。百姓感念先人治水功德，形成了崇德向善的精神信仰和独特的水利祭祀文化，让以倾家兴水、无私利民为内核的尚义精神，成为长泰代代传承的精神底色。

古陂是维系闽台乡情的载体。长泰是著名侨乡，历代侨民远赴台湾谋生，将古陂低坝引水、长藤结瓜、陂长共治的水利技术与治理模式向外传播。长泰籍人士郑鸿章曾任四川省水利工程处总处长，1948年调往台湾参与日月潭和大甲溪建设，当地众多长泰籍后裔仍保留祭祀陂神、妈祖、重视水利公益的传统。龙津古陂成为凝聚闽台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龙津古陂不是陈列静止的古迹，而是生生不息、造福当下的活态灌溉遗产。一陂清水，流淌的是顺应自然的科学智慧，镌刻的是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滋养的是崇文尚义的人文风骨。如今，古陂焕发新生、再启新程，持续滋养一方水土、赋能乡村振兴、传承治水文脉，书写着古老水利遗产活态传承、古今共生的崭新篇章。

（上接1版）我们要清醒认识党担负使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自觉地坚定地遵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务更加艰巨

全面从严治党是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怎么样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及其先进性和纯洁性，是破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的重要内容。

执政，就是掌握国家权力。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在执政问题上面临的是既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又不能因为手中有权就脱离人民群众的双重考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防止权力诱使我们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今天遇到的挑战远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问题更为复杂。第一，我们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要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要长期接受人民的监督。第二，党要长期执政，就不可避免地要和“权”打交道，要长期经受“权”的诱惑，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第三，党在长期执政中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利”打交道，要长期经受“利”的诱惑，防止党员干部不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摆在首位，防止个人利欲熏心、贪欲膨胀。第四，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长期执政，就不可避免地要过“人情”关，要长期经受“私情”的诱惑，防止不讲原则、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第五，党要长期执政，就要经受党员干部迭代更替时红色基因长期传承的考验，一批又一批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正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没有前辈们经历过的生死考验和艰苦环境的磨炼，要防止红色基因淡化、变色、失传。“长期执政”就是“长期考验”，“长期考验”就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全会强调“持之以恒”的意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比战争年代党的建设更为复杂的“执政党建设”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胡锦涛提出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要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才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有严格的界定，就是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全会《决定》指出：找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一手抓“自我革命”，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全会在深入分析当前党情时指出，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对教育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党的队伍主流是好的，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部分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少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党性不强，理想信念动摇甚至缺失，群众感情淡薄，政绩观出现偏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斗争精神不足，不担当不作为，不守纪律规矩，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强甚至软弱涣散，一些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够全面、有效。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得力、制度执行不严格，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突出问题，甚至任由歪风邪气滋生蔓延。全会在深入分析党情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自觉地坚定地遵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三个更加艰巨”考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全会提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这是巩固和发展全党高度团结统一、党心军心民心高度凝聚良好政治局面的必然要求；这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把党建设得更好、更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从考古看文明